



# 九叠篆的来龙去脉\*



陆锡兴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的印章文字发生了多次变化,秦八体摹印汉六体缪印有明文记载,对玺印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金时期印章文字出现了重叠笔画,史称九叠篆。不过九叠篆的制度如何,名称的由来,其特征性的缠绕重叠的形体来源均尚多阙疑。

古今玺印文字发展由钤泥封检转变为钤纸帛,印文由阴款变为阳款,印面由小变大。隋唐时代朱文印章的使用,促使了印章章法的重大变革。入宋以来,朱文印面的文字章法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由疏变密,整齐紧凑,笔画均匀,横竖笔画平直规整,有些文字笔画反复盘曲,形成笔画多叠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叠篆见于史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铸叠篆。《宋史·舆服志六》:“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

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如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玺,也叠篆。《宋史·舆服志六》:“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

靖康之变,北宋宝玺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彻底毁坏,此类印玺多散失,湮没无闻,现在仅有零星存世。传世的“内府图书之印”(图一)诸字均缠曲反复,其中“之”字十三叠、“印”字九叠,都是特地留出空间给叠笔的。吉林舒兰征集到北宋涂金印,据说是金人劫掠之物。“中书门下之印”(图二),中书门下为中央官署,此印也为叠篆。江苏丹阳发现的南宋爵号印“弋阳开国”(图三),也是叠篆,其中“弋”字七叠,其他字均有叠笔。此三印风格接近,笔画中粗,刚柔相济,“内府图书之印”尤其精美,呈现皇家风范。对于一般官印,史籍并无叠篆的记录,从各地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宋代官印看,虽然偶见叠笔,却构不成制度。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的“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图四),“化”左旁叠笔,“第”下叠笔,“记”左侧的叠笔,“曹”字下“日”字变成空框内“吉”字,相反上部笔画简化了。陕西三原县高渠乡发现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少府监铸的“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图五),仅“第”末笔往返成叠,“蕃”字上部四画加叠,“朱”明显,也仅二叠。北宋和南宋的官印一般没有加叠。

例如北宋的“雄胜第十军指挥使记”、“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神卫军右英烈第四指挥都虞侯记”。均无叠笔。杭州西湖发现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没有叠笔。据此,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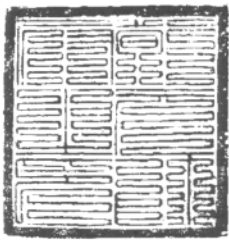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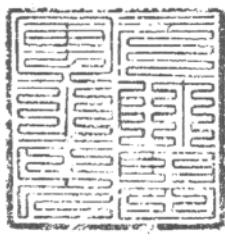
\* 基金项目:江西社会科学研究“十五”重点项目“汉字形体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6WX03)的前期研究成果。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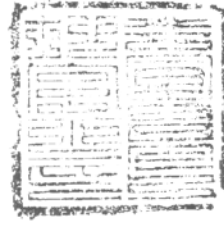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图一一



图一二



图一三



图一四



图一五



图一六



图一七

曾广庆指出,有些文章把宋代官印统称九叠篆似为不妥。对照文献和发现的实物,宋代叠篆制度是有范围的,只限于皇帝玺印、爵位印、中央官署和京师衙署用印,少量官印中的叠笔,叠数也不多,不在于制度所定叠篆范围。

金代开始官印普遍使用叠篆。各地发现的金代官印数量不少,尤以河北省为多。所见金代官印都是叠篆。如,承德发现的金代早期的“元帅府印”(图六)、保定征集甲申“都元帅府之印”(图七)、承德发现的“元帅监军之印”(图八)、保定发现的“元帅府监军印”(图九),隆化发现“兴安西北等路元帅府印”(图一〇)、唐县发现“都统之印”(图一一)、易县发现“副统之印”、怀来发现“山东路副统军之印”(图一二)、岳城发现“行军万户地字之印”(图一三)、平泉发现“万户住字号印”(图一四)等。金代的官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所有官印无一例外,均有叠笔。二.每印并非每字皆叠,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行军”中“印”三字和“山东路副统军之印”中“统军”“印”三字没有叠笔。三.同样的印文叠笔并不相同。如“都统

之印”(图一五),唐县发现的和内蒙古发现的叠笔并不相同。

宋金时代的叠篆制度记载很有限,特别是具体的叠篆之法,更是语焉不详。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叠篆字形的处理办法,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直线变曲线。通过对直线的加屈,把相对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使得稀疏的笔画变得茂密。这是叠篆的主要标志,所谓八叠、九叠等等均以此为准。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内”“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处加叠。“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笔伸展叠笔,而“人”却是把两笔直线改成平行的曲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印面越大,叠得越多,字数越少,叠得越多。“元帅府印”四字,“元”字六叠、“帅”字七叠;“都元帅府印”五字,“元”字四叠、“帅”字五叠;“元帅监军之印”六字,“元”字三叠、“帅”字四叠;“元帅府监军印”六字,“元”字二叠、“帅”字三叠。

其二,单线变复线。如山东苍山兴明乡出土金末铜印,叠篆“虎威副都尉印”(图一六)。右侧凿刻“壬

辰年正月春”印钮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笔,“副”字内“田”中“十”写成双钩“十”。

其三,改变结构。为了增加叠笔,或者便于处理叠笔,改变结构是常见的现象。如上述金代两个监军印相同,一个比较工整,一个比较粗放,两者字形、叠笔不同。其中“监”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亚”,后者似“巫”,写法不一。有的只是笔画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结构的改变。如“元帅府监军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笔方向相反,便于顺势加叠。

其四,采用减笔字。某些笔画繁多的字,没有空间可以加叠。就采用它的异体字,无论俗体或者古体,只要笔画少即可。例如金代“行军万户地字之印”中用“萬”字正体,而在“万户住字号印”中却用俗体字“万”,不用正体“號”,用了俗体“号”。前者因为笔画繁多,没有叠笔,后者笔画变少,均有叠笔。九叠篆的叠要害在于增笔来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样化的。

宋之叠篆,虽未称为普遍的官印制度,却成为辽、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辽之契丹文官印,如辽宁凤城发现的契丹大字印(图一七)<sup>⑪</sup>,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图一八)<sup>⑫</sup>。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东光发现至元十六年中书礼部造“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印”(图一九)<sup>⑬</sup>。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叠篆盘曲缠绕,酷似汉文。元代的汉文印使用九叠篆,文字基本与金代官印一致,可知两者的承袭关系。北宋以来,叠篆实际成为官印的象征。

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明史·舆服志四》:“百官印信,正一品至从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条记,‘俱直纽,九叠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九叠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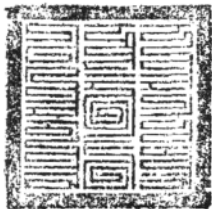
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

御史印用八叠之说仅见于《明史》,八叠与九叠实在难以区别,实际操作并不容易,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八叠印章,恐是仅仅在洪武年间使用,以后废除了。明代正史出现了“九叠篆”这个名称,“九叠”之“九”含义多有说辞。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编·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

沈德符唯知当朝,不知宋以来已经流行叠篆之法,“乾元用九”作为九叠出意纯属猜测。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义:“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九叠篆柔屈盘缠,字之至柔。体现以君道之阳刚驭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不过沈德符的说法,已经说明“九”不是实数。明代印制,官印叠数多寡与官职高低无关。监察御史选用八叠,只是为了与其他官印区别,显示其特殊身分而已。清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之十二举曰:“后世官印有九叠、八叠、七叠。皆朱文,私印亦间为之,九叠又名上方大篆。刘昌曰:取乾元用九之义,八叠,明监察御史印用之,取唐台仪八印义,七叠,历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明代官印除了“八叠”有史载外,其他叠篆还没有实证。明代官印存世数量不少,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收录了三方明代九叠篆官印,都是九品以上的方印,其中一枚“禾屯吉卫指挥使印”是永乐七年(1409年),礼字四十三号。它在1974年吉林洮安出土<sup>⑭</sup>。各地的考古发现,数量较多。例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浩特市发现明代铜印,印文“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图二〇),圆柄左方刻“礼部造”“永乐四年十月日”<sup>⑮</sup>,湖南澧县征集到南明唐王朱聿键给藩封华阳王朱敬一的王印。印面“华阳王镇抚司之印”(图二一),背阴刻楷书“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给王臣”<sup>⑯</sup>。云南大理洱海退水时,经常发现明代卫所官印,1986年为止,计有28方。除永乐元年(1403年)、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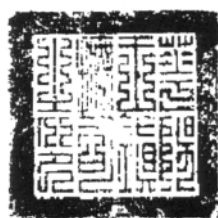
图一八



图一九



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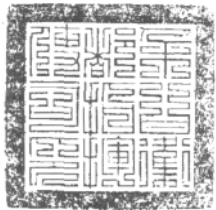


图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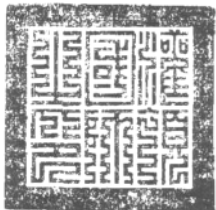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图二五



图二六



图二三



图二四

四年(1525年)各一枚外,均为洪武年款印,最早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晚嘉靖四年(1525年),为大理、洱海、蒙化、澜沧、大罗卫所建制。为九叠篆。值得注意的印文笔画之间距离均衡,而且满印面多见横线,与元代八思巴篆体印相似。它是经过处理的,以笔画简单的加叠,如“户”

变直线为折线,如“洱海卫右千户所百户印”(图二二),而且同一个字在一个印面中加叠有变化。此印中行“千户”之“户”,下成四横,后“万户”之“户”下成六横。甚至不惜在不宜变化的部件也加叠,如“大理卫右千户所百户印”之“理”字,左旁“王”就最末横笔向上延伸加叠外,右旁“里”之“田”左右两侧加叠多出四短横,形成整字左右相仿的格局。“大理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虽同为九叠,“理”字“王”旁中间写成一个“田”字,没有前二印加叠。而“印”字叠文完全相同<sup>⑦</sup>。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千户所千户玉印“湖广靖州卫守御城步正千户所千户张关防”(图二三),为明弘治年间正千户张升之印,此印规整严谨,无论每字笔画多寡,所占空间相等,每笔之间距离完全相等。它是九叠篆中章法最佳的作品之一<sup>⑧</sup>。嘉善县凤桐乡发现南明关防“总理两淮盐法兼督江防军务关防”(图二四),印体右侧楷书刻款:“弘光元年(1644年)四月 日”左侧刻款“敕字五百十四号 礼部造”。此印宽边,字形茂密,笔画较粗,除了“江”“防”有明显的九叠外,大多数字只是稍有加叠,“盐”“法”“兼”“督”“关”根本没有叠笔<sup>⑨</sup>。在西藏、青海收藏明代敕赐地方的印章。永乐五年(1407年)二

台银印“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图二五),九叠篆,线条刚劲挺拔,后世称之为铁线篆。洪武五年(1372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之印”,九叠篆,笔画粗方,有棱角。永乐四年(1406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阐化王印”(图二六),九叠篆,线篆,双边,粗框内,加细框。永乐十一年(1413年)驼纽金印“阐教王印”,也为九叠大方篆<sup>⑩</sup>。宣德二年(1427年)象牙印章“真修无碍”。线框,

字形规正,方中见圆,类似后世之闲章。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涂金铜印“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印面文字大小错落,笔画均匀<sup>⑪</sup>。两印皆九叠篆,但是叠笔很少。明代的官印文字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叠篆制度,并且具有时代的特点。首先严格遵照传统小篆的字形结构,放弃宋金官印违背文字结构,各种离奇写法。其次,印内各字所占的空间相等,同样大小,而且不管笔画众寡,各字笔画密度统一。大大减少大小字错落,尽量各字空间相等,使得文字排列更加整齐。再次,字形整饬严谨,笔画方圆合度,新创的铁线篆,细如毫发,一丝不苟。总之,明代的九叠篆在各个规范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

《宋史·舆服志六》明言叠篆取法汉代缪篆,“屈曲缠绕,以模印章”。它主要出于章法,朱文篆书印面大,字少,或者印文中某些字笔画特别少,就需要根据情况,增加不等的叠笔。无论宋、金,此类少笔字加叠都是如此,所谓叠篆主要在这些字上体现出来。从宋金四种叠篆法看,莫不是从平衡印面,处置叠篆措施。明代官印文字整饬,充分利用叠笔调节字之大小,笔画之疏密,使得印文平均,饱满。清代继承明代制度。甘旸《印章集说·国朝印》云:“国朝官印文用九叠而朱,以屈平满为主。”指明了九叠篆的作用在于印面的饱满平实。在叠笔为特征的官印形成的风格,具有明显的区别功能。金宋对峙,南北分裂,金朝的九叠篆与南宋的篆文明显不同,可以资区别。同样官印九叠和民间的印文也可截然分开,一方面印文缠曲难以辨认,便于保密,另一方面文字茂密,异乎寻常,使人肃然起敬,产生威严感觉。

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篆体,它并非篆体本有的体式。它的来源很少有人论及。

《宋史·舆服志》云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

为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它暗示了九叠篆出于汉代的缪篆。汉代之缪篆,其含义争论不止,至今尚未有可信的结论。不过我们反观汉印的实际情况,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较为饱满,并没有见到反复重叠的文字,所以认为叠篆出于缪篆并不是客观的。元吾邱衍早就指出:“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sup>②</sup>已经断然否认叠篆与缪篆的关联。

唐代的印章篆文是否有叠篆呢?唐代官印的篆文带有南北朝

以来的俗体篆字,笔画疏散,伸张自由,字形不甚规整,与一般书写体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印面的文字安排不甚讲究,体现不出汉魏以来茂密的章法。同时没有发现类似九叠篆格式的印文或者类似风格的官印。元吾邱衍《学古篇·三十五举》云:“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颜鲁公有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颜鲁公官诰也称颜鲁公自书告身,现在有纸本存世。墨书文字之下钤满尚书省印,可惜印文不甚清楚。河南灵宝征集的“东部尚书吏部之印”(图二七)<sup>③</sup>。为玄宗以后留守东都洛阳尚书省吏部官员之印。两个“尚书”官印基本格式相同,但是印文中仅有“之”字有曲折。很明显唐代官印不是与宋金的叠篆,两者没有发展的逻辑。这点清陈澧《摹印述》已经指出:“昔人谓唐时印皆九叠篆,其实不尽然,历万榭尝扁之矣,九叠篆甚俗,然实出于缪篆屈曲填满之法,但加甚耳。”

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缠绕的篆法,叠笔是一种成熟的书法技巧,流传有绪。洛阳东郊发现的郑(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权)“孟夫人铭”,“夫”下为叠笔,成“亞”字状<sup>④</sup>。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发现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志一合,志文楷中带行,笔画柔劲,字迹精美。志盖俗体篆文“唐故王君墓志之铭”,系双钩字体,笔画体形均呈方形。其字结构多有叠笔(如右字例),横画两端向上短竖,或短竖在加二叠,“口”成山字形,其中间竖笔呈长“口”字形,“唐”“王”“墓”“志”“之”,形<sup>⑤</sup>。可见叠笔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隋唐时期就流行了。不过唐代叠篆不成规模,而且与官印无关,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宋金的叠篆与当时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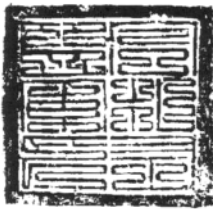
图二七



图二八



图二九



图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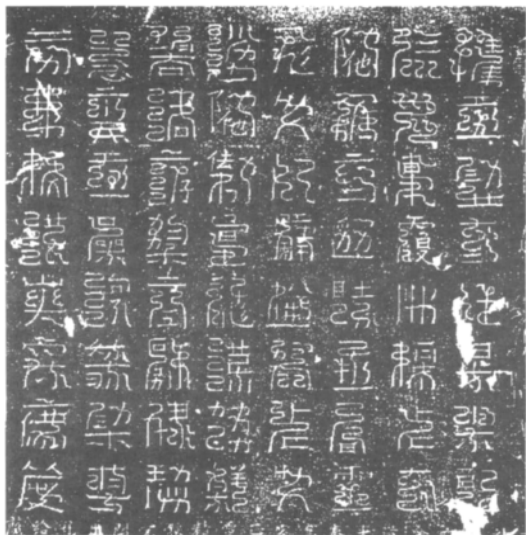
图三一



图三二

两者非常密切的关系。洛阳机车厂出土的“治都总摄之印”铜印(图二九)。印文两行六字,方体,中间穿插北斗七星。《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亦载此印(图二八),为云篆,多取圆势,字形的变形很大,不易识别,值得注意的是名之为“叠篆”。记文云:“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取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叠篆。”赵振华认为“道教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得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印式”<sup>⑥</sup>。比较宋代的道教印和金代的叠篆官印,面貌相似。例如上述两个道教印之“摄”字提手旁和保定征集金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合札左监军印”(图三〇)中“札”字的木字旁同样改作两个相叠的两个“山”字。保定征集金大定三年(1163年)“涿州节度使印”(图三一)中“涿”“度”等字的大变形与道教的圆篆印的处理如同一辙<sup>⑦</sup>。四川建阳万年村挖土发现铜印,阳文篆书“道经师宝”(图三二)篆文道教印,钮两侧阴刻楷书款“正德三年”(1508年)“先天□□”铸<sup>⑧</sup>。这是难得见到有明确纪年的道家用印。字形依然是叠篆体,不循文字结构变形,如“道”字、“经”字之右旁,“师”字,均与通行篆字不同,同时叠篆,不类明代的官印叠篆,却与宋金叠篆结构相似。道教印章文字破坏结构的变异方式,与宋金、特别金代的叠篆十分接近。有三种可能造成这种状态:一种是道教印模仿官印,另一种是官印模仿道教印,再一种就是两者同出一源。我认为最后一种同出一源更合乎事实。





图三三



图三四

道教秘文是一种宗教文字，它来源于东汉时期的民间俗体，早就与通行字分道扬镳。汉代复文是较早的秘文，以堆叠同样文字（主要是“日”字）为特征，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篆体秘文——云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云篆的特征是破坏字的原来结构，笔画往来盘曲，似祥云缠绕连绵不断。云篆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道教的隐秘文献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镇墓真文就是此类秘文。镇墓真文已经发现了多处。唐代有咸阳梁王武三思墓内出土一合，为“灵宝赤帝三炁天文”。西安庞留村唐寿王第六女清源县主墓，出土镇墓石全套五合。陕西蒲县唐桥陵发现两方镇墓石，称为“南方镇符瘞

石”“西方镇墓镇符瘞石”（图三三）<sup>⑨</sup>。宋代的真文镇墓石的年代集中在北宋后期，以徽宗朝最多。20世纪50年代成都近郊宋墓不断发现，最早在宣和年间，最晚在绍兴年间其中一墓出土八件，1984年成都北宋张确夫妇墓出土真文墓石两件，1996年成都市石羊乡宋墓出土真文七件，1996年成都北郊甘油村宋墓宣和六年（1124年）出土砖制镇墓真文四件。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两墓共出镇墓真文10方，为东、南、西、北、中，各一套五方（图三四）。根据墓志记载，生于宋哲宗元丰元年（1078年）卒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sup>⑩</sup>。

隋唐石刻上的叠笔篆文、唐宋真文、道教的秘文印章，以及宋金时期的叠篆均来源于道教的云篆文。云篆文较为难认，笔画多叠，一眼望去，满篇都是云缠雾绕。它以变形为特征，其法有增笔、减笔、变换部件等，同时大量使用叠笔。如“一”可以七叠，“八”左四叠、右六叠等，此类文字在道教经书中有专门介绍<sup>⑪</sup>。

官印叠篆是从秘文、或者直接从道教印章文字借用过来，但是道教的云篆随机性变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话，文字会变得无法辨认。宋金以来的官印的叠篆，排除了那些过度变异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叠篆出于云篆，却有别于云篆，是可以识别的，并没有释读的问题。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采用叠篆的形式，因为这些文字结构上没有汉字复杂，笔画要少，特别是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体简单，叠笔来回繁复，根本无法认辨。唐宋时期因为朝廷尊奉，道教盛极一时，采用叠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一般的文字，道教认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镇鬼驱魔，号令天下。官印采用叠篆，不仅给人以神秘感，同时寓意了道教的无边的法力。

注释：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第1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自曾广庆《宋代官印制度略论》，《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董学增、高素心：《“中书门下之印”小考》，《文物》1984年第9期。

徐铁城：《江苏丹阳出土‘弋阳开国’铜印》，《文物》1986年第11期。

、<sup>⑬</sup> 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

王天喜：《陕西三原发现一枚宋代官印》，《文物》1995年第10期。

（下转第134页）

终在早期农耕者食谱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时,转向采用木制器物。虽然这种转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上述民族学和实验资料都支持这一重构。最后,自由脱粒的谷物在前陶新石器B段的进化可能也影响到这种方式的产生。

### 结 论

野生谷物加工的艰辛程度普遍被低估了。对拉文特的觅食者来说,除了在有压力的时期,野生谷物可能并不是“具有吸引力的”植食。拉文特磨制石器工具特有的功能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磨制石器的材料表现出食物加工强化的两种情景,它们恰与定居(纳图菲早期)和农业(纳图菲晚期—前陶新石

器A段)的出现相对应。当食物的密度与可储存性压倒对加工成本的考虑时,农业也许在新仙女木期得到了促进。碾磨工具的数量增长显示人们要最大限度利用有限地区的植食价值,这使得相同的(或较小的)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拉文特磨制石器工具进行的化学残渍分析。另外,用实验方法对加工各种拉文特植食所得的产量进行比较研究将意义重大。同时,令人感兴趣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野生谷物和驯化谷物的重要样本都出现在干冷时期,受民族学资料的启示,表明觅食者在干旱地区或干旱时节会重视这些种籽。

(上接第148页)

赵人俊:《杭州西湖发现宋、金、元铜质官印》,《文物》1959年第4期。

曾广庆:《宋代官印制度略论》,《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均见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河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1984年第9期。

林茂法、宋振启:《山东苍山县出土金代“虎威副都尉印”》,《考古》1988年第7期。

⑪ 武家昌:《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文物》1984年第9期。

⑫ 史金波等:《西夏文物》,图166,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⑬ 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第92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⑭ 汪宇平:《呼盟乌兰浩特市北方发现明代铜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⑮ 曹传松:《湖南澧县发现明“华阳王镇抚司之印”》,《文物》1984年第11期。

⑯ 杨益清:《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文物》1986年第7期。

⑰ 丁中炎、魏人栋:《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玉印》,《考古》1986年第1期。

⑱ 朱瑞明:《浙江嘉善出土一方南明官印》,《文物》1990年第3期。

⑳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封授西藏地方官员的印章》,《文物》1981年第11期。

㉑ 白万荣:《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文物》1984年第9期。

㉒ 《辍耕录》卷三十“印章制度”引。

㉓ 郭敬书:《灵宝发现唐“东都尚书吏部之印”》,《文物》1989年第7期。

㉔ 马三鸿、张书良:《洛阳发现“郑”刘开妻孟夫人墓志》,《文物》1999年第1期。

㉕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㉖ 赵振华:《洛阳出土“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两印内容均引自此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㉗ 郑绍宗:《河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1984年第9期。

㉘ 方建国:《四川建阳出土明代道家印》,《文物》1987年第11期。

㉙ 雷武新:《唐桥陵五方精石》,《书法丛刊》2007年第1期。

㉚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文物》2006年第12期。

㉛ 陆锡兴:《汉字的隐秘世界——汉字民俗史》,第330~3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慧中)